

德意志社会主义

Deutscher Sozialismus

[德] 桑巴特 (Werner Sombart) 著

杨树人 译



Deutscher Sozialismus

德意志社会主义

[德] 桑巴特 (Werner Sombart) 著 杨树人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意志社会主义 / (德) 桑巴特著 ; 杨树人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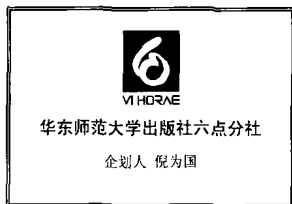
2 版.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617-8102-9

I. ①德… II. ①桑… ②杨… III. ①国家社会主义

研究 -- 德国 IV. ①D091.6: D095.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6728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德意志社会主义

(德) 桑巴特 著

杨树人 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周一民
特约编辑 姜 乙
封面设计 董贇贇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 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市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1
印 张 13.25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102-9/D.154
定 价 2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出版说明

被西方和东方的列强强行拖进现代化以来，文明中国的变化真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山河如此，学术亦然。然而，新的中国收拾河山、重整乾坤，仅仅百年，气象焕然。

新的中国是无数先辈用一己生命在半个多世纪的浴血奋斗中换来的；同样，新中国学术的基础是无数先辈学人在惶然多难的民国三十多年里奠定的。费孝通、王力、吕思勉、杨树达、蒙文通、朱生豪、罗念生、朱光潜、徐梵澄……数代鸿儒，无一不是在艰难时代以一己生命赓续中国文明之线——“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在他们身后，如斯学人屈指难数。

不忘前贤、重刊旧籍，是有历史责任感的出版者应尽的义务——欧美国家凡有文明历史感的出版社，无不把重刊旧籍作为本己要务。时值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六点学术”推出这个系列，不仅为了纪念我们的学术父辈们曾经经历的那段艰难历史，也因为无论中学抑或西学（尤其翻译），都有即便当今学术也未

能有所速的成就在焉，值得珍惜和承继。

重刊民国时期学术成果，实非什么创举。可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名人”们的书反反复复、名目繁多地编印，少有出版者理会晚清和民国时期好些兢兢业业、深造自得的中坚学人，造就了更多历史“失踪者”。重刊旧籍，除了挑选书品时眼界需要更宽些、更细致些，敬重前贤的态度同样重要——影印本一类做法，无异于让旧籍重归故纸。“六点”的做法是：重新排版、校订文字（明显的错字、标点）、统一译名（不少人名和术语的译法，今旧差别很大）——从而，学术父辈们的心血将继续滋养后来学子。

“六点学术”有心用后现代的纸张和排印技术挽救前辈们的故旧文稿，盼学界有心人鼎立推荐、匡正谬误，一起来寻回我们丢失了的学术父辈们的书籍。

点点

2005年7月7日

作 者 序

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成了我们的兴趣的中心点；本书所讨论的虽是这个问题，却绝不愿其成为一种流行式的文章：因为这本书尽管可以在10年15年前写成，而我恐怕，即在30年后，还是一本“现实”的书，或竟尤甚于今日。这不是一种流行式的文章，因为我对于我们政府的政策存心没有直接讨论。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于希特勒(Hitler)政府漠不关心，或竟是存有敌视态度。这太谈不到了。我之所以放弃与当道逐一辩论，而对于我们政府的政治措施以及我们握权人的意见仅间或考虑到，并且多半是限于举例式的，其原因在于我确信，这一种态度能给予我的国家以最好的报效。

我在本书里指定的工作是：代现时的各种社会问题定一个统一的概念；怎样从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出发，去获得这一个

观念？这工作只有在距离日常政治相当的位置上，才能完成。因为只有在这位置上，我们才有能力看清这问题基础上的简单性与其结构有着必然联系的整体观念（本身的简单处在及与本身有附属错综关系的复杂处在）。我力求把一切惯用的名词分析起来，把一切理论上的、实际上的词句还原到其最终的意义本质上去，到处追寻其基本着眼处及其系统的联系处。指出那在思想上有统一的所在，把它缺乏的创设起来。

这个方法我同样地、并且正要实用之于那些敌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上，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倘使读者在本书的第三卷中——那儿我从事叙述马克思主义的意念——特别觉得头痛，那么他应当不为艰苦而灰心；因为那些理论的强处就在于其技巧的结构和完固的系统，求一度认识此点，是对于每个在今日而要谈政治事件的人所不可避免的要求。

谁要以为这种求概念辩明和系统分析的努力过于理论、过于教授化，因而认其对于生活形态为赘余，那么他是受了一个极重大的欺骗。他蔑视了思想的权力。科学（其首要任务即在于辩明）对于“生活”，此处即指政治，也是贡献的。政治家固不能按照学理去创造他的工作：这样，他会成为一个不育的（不能成事的）理想家。但是他应当携着学理去创造：因为他应当站在认知的明光之中。我们有不可胜举的聪慧政治家，曾如此行事——即在革命时代也有。当然了，那些“学理”也一定要适宜于烛照真相。

在这广无涯际的著作洪涛中，这个会同着民族兴起（Nationale Erhebung）浇到我们头上来的洪涛中，形成的“学理”太多了，而这些“学理”也不能自胜其任。有的是藏在惯用成语名词之后，制造成半透的“理论”，供给日常消费之用；有的是更糟了：把信仰

与知识的范围,认知与行动,科学与政治疆域不健康地不“忠实地”混杂起来,大讲其空泛的不审理主义与神秘主义(Irrationalismus und Mystizismus)而很奇异地把那明晰的概念思考,那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教训我们的,指斥为“自由主义的先入评判”(Liberalistisches Vorurteil),甚至为可谴的外国货,不值为善良德意志爱国志士一顾。这种“理论”之不良,尤甚于无,因为它们不但不能光照政治家的途径,反而使它越发黑暗了:

Vis consilli experts

Mole ruit sua.

苟无忠告,困难乃毁其权力。

要驱除这种内伏的危险,没有别的方法,最好是用明晰的彻底熟虑的观念和它对立起来。这也正是真正的科学所不可或缺的责任。科学的存在是在于用它的光线明照,而不是增加热度。

因为本书讨论的是社会主义,所以所有的社会问题的全部势必——其原因我们对于后文见之——都卷进去不可。我仅提出一个限制:我把外交政策以及国家边界问题划出我研究范围以外。这当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些是次要的。正好相反:我确信,它们极其重要。德国社会内部组织的构型自然完全不同,看德国是否为俄国的一个行省或是为再度战胜的西方列强所瓜分;看我们是否领导着一个“中欧国”(Mitteleuropaisches Reich)或是与法意共同建设一个泛欧罗巴;看我们是否因为打了一个胜仗而可以扩大我们现有的人口或是最后——看我们是否维持着原来的

疆域。

一个关于内政的研究工作绝不能够顾虑到这一切的场合：不然，不确定的指数一定会太大，以至任何确定的结论都得不到。因此我把我的观察建筑在前述的最后一个假定可能上面。

此外我也没有顾虑到一个很在可能范围以内的场合，即德国在未来的数十年中，可以是若干敌人包围之下的一个军营。那应当另有特殊的计划。

这样这本书就出世而自觅其地位了！它会找到若干反对的人，在我是毫无疑义：在执政党的内与外。不过我并不有所懊悔。经过矛盾才有真理出现。而我更敢于希望在本书中所发挥的精义终于有一日在实际政治上能产生一点影响，即令其为细微的一点。民族运动中(Nationale Bewegung)最好的，最有希望的，最真德意志的一点，就在其信誓不是一种凝滞的信条而是一个正在不可分离的我与反我奋斗而求(构)形之中。在这个奋斗之中每个诚恳的信征都应当参加。参加的前题，当然是要以民族运动的观念为界限。一定要国家主义的，但一定也要社会主义的。

至于这些概念往往可以有很不同的讲法，我们可以由我们执政人公示的言论与事实以及讨论德意志社会主义的本书看出。本书的特定工作就是想把那些公认为强有力的势力，努力在社会主义方面求完成国家社会主义意念的势力，引入于轨道，引入于不会趋于毁灭而有结实可能的轨道之中。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意义的观解，虽说现在仍然是极其纷杂：可是在我们对于民族运动应“诺”的人当中，则有一种共同的精神，我们自此精神出发而思考，而行动：也就是自此精神出发，

所以写成此书,这个精神用文字表示出来就是:

一切为的是德意志国!

Werner Sombart, 1934 年 7 月

Grünewald 柏林

译者序

I

桑巴特(Werner Sombart)是70岁的老教授,在国际学识界很有资望,对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有深刻的研究。其著作有各种语言译述流传很广。本书名为《德意志社会主义》,但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观念,他曾于本书中明白指斥这些观念的谬误。他虽说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然而本书却不是代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歌功颂德”之书;与其说他赞成国家社会主义,毋宁说他是适应环境,好提出本书为国社党的南针,代该党定方案。只看他在绪言中说:“我其所以放弃与当道逐一辩论(者)……其原因在于我确信这一种态度能给予

我的国家以最好的报效。”“它(本书)会找到若干反对者,在我是毫无疑义:在执政党的内与外。”“本书的特定的工作,就是想把那些公认为强有力的势力……引入于轨道,引入于不会趋向于毁灭而有结实可能的轨道之中。”一定可以明白,他对于国社党并非毫无保留,完全赞同。

环境逼迫我把这一段不必要的声明,列入“译序”之中,并且排在第一段,译者实怀着二重的苦心,隐着双料的苦味。

我并不欲高抬桑巴特,以求增加我译者的地位。这太谈不到。我说他不代表共产主义,不偏袒国社党,也更不是想插起“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标儿。因为本书的内容可供考证。然而我毕竟是做了这不必要的声明;实诚如我所述,有二重苦心,双料苦味:

自从我们的祖国受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压迫以来,最合时的口头禅是“维新”,是“建设”,是“赶上欧美各国”,并且要“迎头赶上”。人们目迷于五色缤纷的物质,这一切口头禅的实质内容当然也只是指物质和这种物质所形成的外表构状,意即谓:要凭借我们众庶的人口,蕴藏的富藏,发展物质,发展物质,发展到胜过欧美各国。天晓得,事不若是之简单!

诚然,我们需要大炮,飞机,坦克,兵舰杀退“杀人放火”的帝国主义(者),这一切都要先从发展自己的物质着手;可是,若以为:只要我们工厂比欧美多,房屋比纽约高,物质享受比欧美盛,或至少也与它们“并驾齐驱”,即算达到目的,那也未免太“埋没”了我们自己,蔑视了一个五千年历史的文化民族对于人类所负的使命,抛弃了我们祖先的遗传宝,并且恐怕要走上了岔道儿,连发展物质的目的都达不到。试只看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谁也没有榨

取它们，压迫它们，为什么现在无法维持其现存制度？不色盲的人们总不会再讴歌那儿是天堂，乐土！

有人要说：这是将来问题，现在我们要埋头发展物质。这“也许”是“言之有理”！因为我绝不忘却此处我是在译书，不是批评，不是辩论。但我要附注一语，恐怕这位发言的朋友忘却了小小的一点：倘使我们放弃操舵，海风会先把我们吹得不知所向了。

比如说计划经济是限制资本主义吗？好，即假定其如此吧！但倘使这“计划”不明资本主义背后的撒旦是什么，即令其能把资本主义的外表形式根本铲除，也是没有用；因为这撒旦仍旧可以在别的制度之中活跃的。

倘使我一定要举例说明我意何所指，我要说：倘我们不得已而必须驱遣“撒旦”，我们应时时弗忘，它是撒旦，要时时防遏其为反。盲目抄袭，没有半点意义，并且实足以酿成不可收拾的致命大患。

我们实不难应用我们本民族固有的哲理明光来照现这种撒旦的原形。可是现在谁要是走这一条路而不被迎头咒骂为“顽固”“复古”才怪呢！我们剩下可以着手的途径只有找外国知者对于他们自己病态的揭示，复述出来，译述出来。

倘使我们的后人修史，指我们现时代为“外人顾问时期”，或许不是形容过甚。因为我们现在不仅在工程，技术，军事，交通以及行政，“行政改良”方面有外籍顾问，并且讲到“仁义礼智信”孔圣人之道也要找外国顾问——请容许我揭示这“秘密”。译者并不欲反对用外籍顾问，并且深知聘用外籍顾问在对外政策上很可以作为有意义的策略运用。

于是我很愿意介绍桑巴特的书面顾问——译述他的书，不过此书中有许多地方专与德国有关，诚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只能参考，没有抄袭的可能。它不需要丰富的旅费和优益的顾问“束修”，并且，倘使我没有说错，他的学识比之于在外国找“冒险事业”的人们大概要高明若干筹。

这是我所谓的二重苦心。

我们的现时代是一个浮动的，不安定的，表面的时代。“人们”失去了定盘心，作事草率，思考不彻底，判断浅薄而无根据。倘使你偶或寄住过青年会宿舍“有人”会相信你是基督教徒；倘使你赴欧洲去，或是从欧洲回来，不取道南海而经由西伯利亚，有人会说你即不是共产党，亦当是联俄派人；倘使你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你不必忧心会没有人奉送你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衔；而类似这种“主义者”也正正好在其案头多插上几本类此的书籍，以表示其“道地性”，读不读，懂不懂又是一问题；倘使你住宅里挂着上海城隍庙或是南京夫子庙的黄雀，这也可以做你的“生物学家”或是“动物学家”的头衔根据；还有……等々等々。

活在这种时代，真是痛苦。一是痛苦，大好的社会竟为这种少数识浅的无聊的“人们”所嚷的“市声”所夺；二是痛苦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清白的人枉遭诬蔑。

这是我所谓的双料的苦味。实则，倘容许我说老实话，这种痛苦，没法计算，没法量，只可以由有血气的人去感觉得到。而“人们”其所以能信口雌黄者，也许即在于他们自己没有灵魂可以感觉到诬与被诬之为可耻，他们要以信口胡编，捕风捉影，暴露其自己心灵上的虚幻！

然而，苦心也好，苦味也罢，在有个性，有自决，有民族意识的

人他只知道努力，不管他是在自由叙述己意，或是没有这种自由而复述他人的著作。在他的思想中，只有一个原则：

一切为的是祖国。

II

现在关于译述上的技术，我还要略叙几句。我首先要声明本书极难译，真有些费力不讨好的情况。第一是本书涉及政治社会种种问题，桑巴特学识很富很广，他充分援引德国的哲学分别讨论，许多概念都要译者自立创译起来，而涉及哲学的句法，在译述上，加倍困难。再则桑巴特生平著作极丰，500页左右的书有十余册之多，此外较小之书册还有很多，他自己形成一个特殊的系统，有许多名词的含意与一般用法不同，这也增加了译述上的困难。其次桑巴特喜用拉丁文风格（拉丁文凭借其完整固有的文法与字法变化），句法复杂繁长，尤其是起承转合都不甚借助于文字，只寓意于文气之中，这在在都使译笔艰窘。这一切再加上德文原有的含浑性，越发使译述困难。

为解决这种种困难的一部分起见，译者于译文中曾试用下列方法，现在要报告出来，目的是求能对于好意的读者在了解译文上有所贡献，并非求对于国文文法有所示意，那该是文字学和文法学家的责任，我很祷盼不久会有创造的统一办法，使我这临时办法成为不需要。

第一个救穷的办法是把动词、名词和形容词充分通用起来，即把原来的形容词动词活用成名词，名词形容词活用成动词。不

过这往往会使文字不畅，且容易引起误解，然而为救穷起见，实顾忌不了此点了。

第二个救穷的办法是充分应用音同意不同原来已有的名词，以及音同的别字，分别去译述原文近似的名词与概念，如：相信，想信；近似，近是；杂色，杂式；自制，自治；尺量，测量；从新，重新；记帐，计帐等等。不过这也有使国文劣化的危险，未为我所顾到。

第三个救穷的办法是遇有原文含义不一之字实行在不同之处分别另译，所以往往有原文同一名词，而有两种或几种译法。我想这大概没有若何重大的弊害。

此外我在译文间有用“文言”之处，这纯粹是因为在各该处文言句法与原来句法结构相近的关系。再则在译文我用括号表示译者的补注，有的是解释；有的是并列几种译法备考；有的是补充原文；有的是表示可以省略，其意义则都完全在于帮助了解。

因此在文字不顺的地方，要请读者原谅译笔困难，并非故意写不通的文字找麻烦。要请原谅，原文本非通俗书，为人人所能读。要请在文气上寻起承转合之处，要请在活用上，在别字上推寻意义，勿判我故意写别字，这是译者所祷盼的。此外关于原文的专门名词如人名地名等，其在中文已有根深蒂固的惯用译名者则尽量采用，其余如尚未有译名，或译名与原文发音相去太远且不为人通用者，则一概用原文写出，我想，能读本译文者至少都在能读拉丁字母的水平线以上，这大概不至成为重大的障碍。

译者深恐本书内容艰深，有难于了解之处，本想借译序的篇幅，写几句简明的摘要，旋以恐貽画蛇添足之讥，因而作罢。而书末所附译的《资本主义之将来》，在某种范围以内，也很能代替一

部分的摘要,所以译者的译序至此为止,即请介绍读者与桑巴特的本文相见。

杨树人,1934年12月16日

南京明故宫